

我拍了一部电影，献给老爸老妈

《四个春天》是一部以家庭生活为背景的电影，45岁的导演陆庆屹将镜头对准了自己年逾古稀的父母。因为故事从2013年春天延续到2016年春天，所以有了现在这个片名。电影之外，这家人又有着怎样的生活？请听陆庆屹近日在“一席”演讲上讲述自己的故事。

讲 录

我走的地方越多，就越热爱自己的国家

张维为

近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谈到中国的饮食文化、家庭文化、市井文化、商业文化等文化特色。以下是张维为教授演讲节选，内容有删减。

我走过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发现各种各样的文化都有长处，不同文化确实需要互鉴和学习。但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中国有几个文化上的特点，与我们的崛起绝对有关。

一是中国人特别勤劳，走遍世界，像中国人这样勤劳的并不多见。二是我们这个民族整体上积极向上，我们总是在想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很多民族不一定有这个特质。所以，我觉得中国崛起是和我们的文化特质有关系的。

大概4年前，一个机构在做上海文化建设的中期规划，请我去做讲座。他们给我看了两个研究报告，里面列出了上海与纽约、巴黎、伦敦的差距。我说，我在这3个城市都住过，我感觉上海已经在很多方面做得很好。除了硬件方面的优势，上海的家庭中位净资产、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等数据优于纽约，可以和伦敦、巴黎比一比；上海的社会治安比这3个城市都好，甚至好多。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是基础性的，非常重要。

所以我提了个建议：为一个城市做规划，首先要考虑这个城市居民的文化偏好，要从中国人的视角、反映出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当时坐我边上有个美国老太太，一边看电影一边流泪。她对我说：这种场景上世纪50年代可能还有，我们现在已经见不到了。

大概20年前，我在纽约看过一部电影叫《喜福会》，故事非常简单，讲的是4位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的母亲对她们的女儿讲述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反映出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当时坐我边上有个美国老太太，一边看电影一边流泪。她对我说：这种场景上世纪50年代可能还有，我们现在已经见不到了。

这背后的现状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传统的家庭结构正在解体。据统计，2014年，美国社会中“父母+孩子”这种典型的传统家庭只占到19%，其他都是非传统家庭。所以我觉得，仅仅把中国人普通的家庭亲情拍成电影，就可以打动很多外国人。

第三是市井文化，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国普通老百姓会把每天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上海的弄堂文化、北京的胡同文化都是如此，有下棋的、打牌的、泡茶的、练太极拳的、跳广场舞的等等。许多“老外”看到中国大妈跳广场舞就特别激动，因为他们的国家很难看到这种市井生活。

还有商业文化。我认为上海的商业便利程度是世界上发达的，在市区每步行5分钟就有一家24小时便利店。还有淘宝、京东等网购，中国现在每天的快递包裹量超过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快递包裹量的总和，可以说是线上线下的一场消费革命。

在欧洲，周末的时候商店要么缩短营业时间，要么关门。而对中国人来说，商店就应该开到晚上9点、10点，不能这么早关门，周末也应该开。快递也是，国内人们往往是当天甚至小时来计算时间，今天明天送到；而国外则是以周来计算时间，想加快速就要付加倍的运费。

此外，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中不崇尚暴力，整体比较平和。如果你在美国生活，很少会听到美国人说饭后散散步，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在纽约，除了像时代广场、百老汇这样一些景点，其他大多数地方你晚上是不能去散步的。而在中国，你开车到任何一个村庄，你可以随意和老乡聊天，买他们的土特产。在其他绝大多数国家，这样的做法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你一出国就会感觉到这种安全感，它和空气一样，存在的时候你不一定感觉得出来，但没有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会发现它的珍贵。

确实，这世界上你走的地方越多，你就会越热爱自己的国家，越珍惜这个国家许多看似普通实际却非常精彩的文化。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演讲 陆庆屹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我爸我妈

我拍了一部电影，叫《四个春天》，是献给老爸老妈的礼物。

我出生在贵州南部独山县的一个小镇，叫麻尾。这个小镇只有一条街道，它与一条特别清澈的小溪并行在狭长的山谷里，因此我童年的记忆大多与青山绿水交织在一起。

那里的布依族、苗族村寨比较多，那些民族都喜欢唱山歌，时常在旷野里能听到很远处的歌声。青年男女会在两个小山丘上对歌，选择伴侣。

我妈妈从小酷爱山歌，并且想方设法学唱山歌，几十年下来，她在当地很有名气，红白喜事都有人找她去助阵。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她总是非常繁忙。

我记得小时候过春节，麻尾举行全民狂欢活动，重头戏是舞龙舞狮，还有骑摆马。就是选出七八个小孩扮演戏曲里的古人，骑上马，到村村寨寨去游街，马走起来屁股甩来甩去，所以叫骑摆马。我3岁多的时候，我妈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对着小人书琢磨着给我做了一套“摆马英雄”的造型。

我爸爸是个物理老师，性格非常温和，我印象中他从来没有发过火。他也酷爱音乐，音乐是他唯一的精神出口，几乎每一种他能碰到的乐器，他都会去自学，他一共会20多种乐器。

他还会做一些简单的乐器，笛子、二胡这些，都是他自己做的。除了工作和照顾家庭，我爸爸其他时间都浸泡在音乐里。他曾经说：有你们3个孩子，有那么好的妻子，还有那么多乐器相伴，此生足矣。

我家在麻尾中学的山脚下，可以说开门见山。我三四岁的时候，因为生活太困难了，爸妈工作之余，到镇上借来大铁锤，用半年多时间开山，生生辟出了几块平地。又到一里多外的地方，一趟一趟地挑来土，壅出两块菜地，种了各种蔬菜，家里生活才慢慢改善。

但即使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家也总是有歌声相伴。除了没有肉吃，我的童年记忆都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样貌。

1998年，我爸妈借钱盖了一个房子，花了半年多时间。但没想到一年后，火灾莫名其妙地发生了。父母辛劳一辈子攒下的一个家，就这样被烧了。

那天我妈不在家，我和我爸面对着焦黑的房间，手足无措，有点欲哭无泪的感觉。我们在一堆炭黑色的东西里东翻西翻，刚买的新电话融化成一团，我姐买的小DV也烧坏了。

我爸从废墟里翻出他的小提琴，背板已经快烧成炭了，他吹了吹灰，叹了口气，下楼去了。我继续在房间里东翻西翻。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听到沙沙的琴声，跑出去一看，我爸在天井的井台上拉小提琴。琴声在空旷中回旋，他的动作很轻柔，似乎想不出发生了什么事，听着残破的琴声，我想，那个时候可能只有音乐可以安抚他。我就站在那里看着他，看了很久，也觉得心情平复了很多。夜里我们俩点着蜡烛，用柴火煮了点东西吃。

第二天，我妈回家来，看着一片狼藉，浑身发抖。她愣了10秒钟，也没问什么，定了定神就跑到楼上去找照片。我们家的那些老照片，被烧得只剩下大概1/5。

照片对我们家来说非常重要，我妈说这是记忆的物证，他们非常留恋时光。

我爸妈年轻时谈恋爱是很秘密的，几乎没有人知道。有一次，我妈无意间听到别人嘲笑我爸穿得一双鞋都没有，她跑回家大哭一场，做了一双千层底布鞋给我爸。那种鞋一般要做半个月，她3天就做完了。

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一口锅都没有，现在的人很难想象那种状况。但即便是这样，我爸妈每年都会攒一些钱，假期的时候，到县城照相馆的付叔叔拍一些照片。

我记得有张照片里是我爸给我妈戴花。前两年，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又拍了一张同样的照片，前后相差53年。还有父母在我们家房子前面的留影，这个房子承载了我很多美好的记忆。

这几张老照片都没有被烧掉，命运还算眷顾我们。现在每年回家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翻看老照片，说说笑笑。这些被唤醒的往事，印证了我们的记忆，填补了那些空缺的时光，似乎一个家的光明更完整了。

北漂生涯

虽然在这种家庭氛围下长大，但我其实从小很孤独，因为哥姐很早就出去求学了。其他孩子都有兄弟姐妹，而我总是落单的，被排挤也很正常。

我很早就习惯了自娱自乐。上初中的时候，我一般都是三四点钟起床，往城郊的飞机场那边瞎逛，回来后煮一碗面，吃完背着书包去学校。我会坐在教室的窗台上，看天光渐渐亮起，同学们陆续进了校门，在操场上走过。

好像我这一生的角色，总是和人群隔着一



点距离，我只是一个观察者。我很少与人交流，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喜欢写日记，每天都写。当天的天气，遇到了什么事，想了些什么，我都会记录下来。

后来到了北京工作，我很喜欢加班，喜欢坐夜班车，那时候人少，坐在角落里，谁也看不清。公交车是不开灯的，只有到站了才亮一下。我就把手伸到书包里，用一只很短的铅笔头在书包里写日记，盲写。写哪个站上来多少人，灯光是怎么划过的，街上有些什么变化，诸如此类。

1999年，我离开北京，去了贵州罗甸县的一个矿山，因为我觉得做什么都是一辈子，无所谓了。但是在矿山，我看到了很多曾经忽略的东西，比如星星，每天都能看到星星。夜幕降临，开始只能看见几颗亮的，眼睛适应黑暗后，星星越现越多，最后布满了整个天空。天空底下，是一重又一重的大山，茫茫地望不到边。我经常坐在山头看着世间万物，感受到人的渺小，也时常为自己的无足轻重而叹息。这些东西对我没有具体的影响，但它打破了我的日常经验，促使我观察身外的东西，注意天地

的样貌、时间的来去、生命的源泉与尽头。就这样，5个月过去了。2000年过年后的那一天，刚刚炸了一个矿洞，大家在洞口等着灰落下去。我不知怎么，也不等其他工人，点着蜡烛就一个人钻了进去。里面黑洞洞的，只听到自己踩着碎石和呼吸的声音。

在寂静里，我发现石壁上炸开了一个十几厘米的口，里面是一窝晶莹的水晶，一根根指向圆心。亮晶晶的光透过水晶折射过来，从各个方向钻进了我的眼睛。突然间我被感动了，心想：它们埋藏在山体里，没有人知晓，仍然朝着最纯净的方向生长，为什么我不可以？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蹉跎？

过了一个月，我离开了矿山。回到北京，我做各种各样的工作。2008年我买了一部相机，拍得很疯狂，每天卡都是满的。

因为拍照，我学会了用不同的视角和眼光去看这个世界。花花草草、日落月升、街上行人、铺在地面上的光，每一种现象我都很有兴趣。因为拍照需要等待和观察，慢慢地，我不再急躁，越来越安静。

2009年，我注册了豆瓣，没想到这是人生的另外一个转折。我在豆瓣开了一个相册《回家》，就是回老家时，记录父母的生活、田间地头的日常、街坊的往来。没想到这些普通的照片下面，有很多评论，让我特别感动。

这种感动促使我去重新审视自己，去观察那些逐渐消逝的小城生活。离开家20年，我所有的审美、思维、习惯都被重构了，变成了家乡的旁观者。我回去的时候不需要跟生活较劲了，可以很平和地看待它，很多意义就在这一片琐碎中浮现出来。这些意义可能是诗意的、现实的，也有一些带着浪漫色彩。

《四个春天》

最开始，因为对家庭气氛的迷恋，让我产生了一种想记录下来的想法，于是我买了一台可以拍视频的相机。

两年多之后，我无意间看到一篇侯孝贤的访谈。电影学院的学生问他：怎么开始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侯导演说：想拍就去拍，你不拍怎么知道如何开始？

这句话很打动我。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素材，为什么不做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呢？

我开始带着学习的意识去了解电影是什么。从豆瓣影评里开始搜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那些碎片化的信息一点点建立起我的电影概念。之前我的观影量可能还不到100部，那一年我一共看了800多部电影，有的电影看了十几遍，电影思维慢慢有了模糊的轮廓。

这期间，我也曾怀疑过自己，有时我会想，自己在这个世界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从过往的人生阅历里，并不能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有一点我确信：每个人都是不可复制的，每个

人都有与世界相处的独特体验，也都可以把这些体验表达出来。对电影研究得越深，我就越意识到，它比我之前从事过的绘画、摄影更适合表达我的感受。

我想做一部真正的电影来献给父母。带着这种想法，我更细致地去观察父母，从而也更深入地了解到父母身上那些普通人的光辉。在他们那个年代，有无数家庭被淹没了，特别遗憾，我希望能够做些什么来献给他们这一代人。

有了这种驱动力，我就特别有热情，经常背着20多斤重的包和三脚架，跑上跑下，跑前跑后。尤其是去山里的时候，为了拍到想要的內容，会跑得辛苦。

2016年春节，我参加高中同学聚会。饭后去KTV，同学包了一个有舞池的多功能厅，几十个中年人在彩色的闪灯下纵酒放歌。我出门坐在沙发上抽烟，两个同学问我怎么闷闷不乐，我说我在想未来。他们扑哧就笑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未来啊？我说：有！

他俩对视一眼，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要做中国最好的导演。其中一个同学腿一软，扶着我的肩膀说：陆庆屹啊，你还是先做我们独山县最好的导演吧。我说：拭目以待。

那天散场后，我回到家里，开始想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的身体逐渐衰弱，我怕来不及了。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剪辑，连剪辑软件都不会用。但是我决定开始，带着忐忑的希望。

我光是看素材就花了一个月，然后去找卖我电脑的小哥装了剪辑软件，我请他教我基本操作，他说只会装不会用。但他建议我买书来学，我一下子茅塞顿开，直奔中关村买了两本教程，回家边学边剪。

我把家里的网络全部断掉，谢绝了所有的工作和朋友。除了扔垃圾和买菜，足不出户，每天和清风明月相伴，与花草为伍。

我住的地方没有空调和暖气。夏天，我把冰袋泡在水里，用风扇把凉风吹过来，但仍然是浑身大汗。冬天，我穿上两件羽绒服，实在太冷就烧水来泡脚。

最后，花了20个月的时间，剪辑终于完成了。在朋友的奔波下，北京的尤伦斯艺术中心愿意安排一场放映，2017年12月30日，正是北京最冷的时候。

映前几天，我回贵州去接我爸妈来看电影。我妈大吃一惊，眼睛都快掉下来了，问我：是在电影院看吗？我说：对呀，她说：是那种大银幕吗？我说：对呀，此前她一直觉得我在胡闹，换了很多很多工作，没有安定下来。

记得有一次她要晾腌菜，我端着相机在一边拍。她问：我吃饭你也拍，走路你也拍，拍这么多干什么？我说在拍一个纪录片。她问什么是纪录片，我说就是电影的一种，她呵呵一笑，上楼晾菜去了。我继续跟着拍。她回过来说我还在，叹了一口气，摇摇头朝我笑。电影对小县城里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他们不敢想象。

那天尤伦斯的放映，我像是做了一场梦。映后交流的时候，有观众知道我爸妈也在现场，就鼓掌让他们上台。

我很激动，在大家的掌声中走上了舞台，她笑中有泪地对我说：早知道你真的在拍电影，我就穿得好看点了，那个头发乱成什么样子了！观众大笑。她又说：祝你梦想成真。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只是对着她笑。

那时我爸已经行动不便了，只能在观众席上站起身，摘下帽子对身后和身前的观众鞠躬致谢。他拿着话筒稳定了一下情绪，颤声说：今天我在大银幕上看到我自己了，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的吧，感谢我的儿子！那一刻，我控制不住就流泪了。

后来，在西宁的FIRST青年影展上，《四个春天》获得了最佳纪录片。领奖回到后台留影，要穿过一小段黑暗的空间，隔着门合上的瞬间，声音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回荡，显得很遥远。几秒钟里，我仿佛跨越了两个世界，恍惚中走下台阶，坐在走廊的墙边，看着手中的奖杯，迷迷糊糊地想起了很多零散的往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快速闪过。

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发现眼前的场景和那个KTV的门口有些相似。我想：至少在这一刻，在这个夜晚，在某个领域里，我没有食言，我做到了最好！



“我觉得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淡泊名利就是完全遵守科学的规律、科学的态度，不被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自己微薄力量融入祖国的强盛之中，此生足矣。”

——近日，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于敏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他在生前接受采访时，这样谈及自己对座右铭“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理解。



“我们的信心来自产品比别人都好，让人不买不行。全世界能做5G的厂家很少，华为做得最先进；能够把5G基站和最先进的微波技术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基站的，世界上只有一家能做到，就是华为。我们在技术上的突破，为我们的市场创造了更多机会，带来了更多生存支点，所以，我们没有像外界想象中的那么担忧。”

——近日，华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任正非在华为公司总部接受了媒体采访，谈及近期的纷扰，任正非这样回答。



“近些年来，史学研究领域存在着碎片化、表面化、片面化现象。这不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真正的历史研究从来不是冰冷的学术过程，而是充满情怀、抱负、灵感的科学探索。新时代中国史学必须弘扬优良传统，努力展现当代中国历史学独特的科学价值和人文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近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这样表示。



“好多人问我：你们搞尖端科研的，一路历经沧桑，你们的人生可以用哪几个字概括？我说，一个是‘痴’，痴迷于核潜艇，献身于核潜艇；一个是‘乐’，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乐在其中，苦中求乐。要问我这一生有何感想，我会说：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事业，此生属于核潜艇，此生无怨无悔！”

——不久前，95岁的著名核潜艇专家黄旭华在接受采访时，对于“如何看待当年的付出和牺牲”这个问题如此回答。



“我的妈妈每天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穿梭，她是一名外卖配送员，尽管她很认真敬业，但有时候也会有人莫名其妙地给差评，甚至有一次因为没有提前送达外卖，客人要让我妈妈赔钱。我希望大家都能对像我妈妈一样的人多一些善意，因为当你打开门的那一瞬间，看见的也可能是我爸爸捧在手里的‘小公主’。”

——日前，在湖南卫视《少年说》节目中，无锡外国语学校初一（12）班的李仁志讲述了自己妈妈送外卖的故事，让无数网友泪目。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